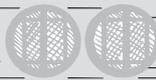




实证调研

Shi Zheng Diao Yan



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

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

□ 张 杰 胡同娟

摘 要：本研究从生活世界理论入手，运用陌生人和返乡者这两个范畴，分析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择偶来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构建出双重意义系统“混杂”的生活世界，从而在看似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再生产的背后凸显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能动者的主动选择与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作为返乡者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乡村意义系统生产时，由于其可以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建构的双重意义系统的生活世界是不稳定的，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世界；陌生人；返乡者；混杂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目前在经验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择偶标准、择偶意愿、城市融入、闪婚、择偶中的社会性别生产等方面。总的研究框架主要是两种：一是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框架，讨论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状态；二是社会性别视角，讨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遭受到的性别不平等。然而，这两种视角都是一种“强结构”预设，认为社会结构（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再生产主宰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过程。虽然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择偶过程中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和传统性的并存，但是基本上将之视为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1]，从而相对忽

略了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的能动性。本研究拟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视角入手，运用舒茨的陌生人和返乡者范畴，来讨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从而在看似性别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女性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看到其主动建构生活世界意义的一面。

鉴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运用深度访谈法对 20 名案主进行访谈，她们主要是皖西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最小的是 20 岁，最大的是 27 岁，大部分年龄在 20-23 岁。大多数新生代女性职业多为服务行业、加工业，如餐饮、商场销售、工厂女工等；学历上为初中和高中学历，初中学历的比例要高一些。

一、都市中的陌生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对都市生活世界的虚假意义关联

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目前学界普遍将之视为边缘人或者是双重边缘人^[2]。然而，从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首先是陌生人。现象学社会学大师舒茨在1944年发表的《陌生人》一文中，运用生活世界理论，讨论了以移民为代表的陌生入问题。陌生人在舒茨看来，由于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所接近群体成员的文化图式，也无法在两种文化图式之间建立某种一般性的转换公式，因而，陌生人始终保持着对所接近群体的陌生性，从而无法成为其生活世界中的成员^[3]。这就意味着在其接近当地人的过程中，陌生人原先所在的内群体的生活世界所拥有的诀窍知识，难以与所接近的生活世界发生真正的意义关联，使得陌生人无法真正获得所接近的生活世界的内群体的共享知识和认同。

“春节回老家后，爸妈就开始催着我找男朋友，我今年都已经23岁了，其实心里也想找个男朋友，可是我身边哪有男的啊，在一起卖衣服的就是那几个姐妹们，平时上班时间那么长，一站就是八个多小时，腿都痛死了，回到家就想睡觉，哪儿都不想去，也没有接触外人的机会，上海是有很多有钱人，可人家哪能看上我。现在最怕情人节、圣诞节的时候了，你也知道的，那一天我不仅是人累心也累呀，别人都是男朋友宠着给买衣服的，我却是在一旁陪着笑脸，给别人一件一件地找衣服试，想想就凄凉。回到租的房子里，看见别人一家人都在吃饭，心里就更加空落落的，感觉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个被上海人瞧不起的外地人。”（Z）

在Z的叙事中，强调了其外地人的身份认同。外地人的隐喻，不仅是一种空间上的隐喻，它首先是一个时间性的生活世界无法建构的问题。从表面来看，Z明显缺乏女性主义的想法，没有把职业视为自己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表征，相反，看到“别人都是男朋友宠着给买衣服的，我却是在一旁陪着笑脸，给别人一件一件地找衣服试”时，感觉就很凄凉。这种凄凉，看起来是来自于孤独，但是根源上还是来自于自身无法在所在的都市生活世界中找到认同。“感觉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个被上海人瞧不起的外地人。”舒茨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一种自然态度来面对我们身处的世界。生活世界首

先是一个周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人与人之间充满内容的互动。“只有作为周遭世界中充满内容的我们关系中的生命才有可能是在”你的“主观意义脉络中的生命”。舒茨对面对面互动对于生活世界的建构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恰恰是这种面对面互动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直接性，使得“我们”关系能够体验到生命流程和共享视域，才能是一个鲜活的人^[4]。正是在这种对互动的体验与反思过程中，我们从行动者转变成为能动者，获得了不言自明的与他人共享的经验知识，稳定的生活世界得以建立。

而Z的劳累和凄凉恰恰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有效地进入都市生活世界中，作为一个陌生人，她缺乏这套共享的经验知识，也缺乏不言自明的都市人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她与都市人的关系是“陪着笑脸”的角色关系，在都市生活世界中，“在一起卖衣服的就是那几个姐妹们”，“也没有接触外人的机会，上海是有很多有钱人，可人家哪能看上我。”缺乏与都市人的社会接触，女性农民工无法在与都市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互动中获得体验和反思，获得我们关系以及我们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意义脉络，从而无法摆脱陌生人的状况。

女性新生代农工作为一个陌生人，对于都市生活世界的交往法则和共享知识的习得是建立在旁观者的“客观意义”的基础上。这种客观意义脉络是一套类别化范畴，很难与都市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脉络发生意义重叠。即使她们努力地学习模仿，由于缺乏时间的过去流向和充满内容的面对面互动，这种学习模仿也始终是客观意义上的，是建立在自身生活世界的内群体的共享知识，从而是一种虚假的意义关联，一种伪生活世界的建构^[5]。

“父母给我在老家也安排相亲了，可是我心里不怎么愿意回去相亲，觉得这个太现实了，简直就像是在做一桩生意。反正我是不太接受，我爸妈现在觉得我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也很想找个男朋友啊，离家这么远，遇到个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说，生病的时候就更可怜了。可是我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自己遇到个一见钟情的，或许是自己的偶像剧看的太多了吧。”（Z）

一见钟情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所理解的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是其用来摆脱自身所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相亲）的新的知识，从Z的叙事来看，是试图通过对一见钟情这种恋爱知识的学习来摆脱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和诀窍知识。但是，这种学习是通过大众媒介的都市叙事来完成的，并没有建



立在与都市人的活生生的互动基础上。

对电视偶像剧的学习，是女性打工妹试图消除陌生人身份、融入都市生活世界的一种行动。因而，爱情作为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自然受到了女性打工妹的关注与认同。W也表达了与Z同样的想法。

“我骨子里是个小女生，希望能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关注对方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我觉得这些都太现实了。”（W）

从Z和W对择偶中的“现实”标准的反感来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现实”的自身所在的生活世界的逃离倾向，是和对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的向往交织在一起的。偶像剧创造出一个陌生人与都市爱情生活的虚假意义关联。通过这种虚假意义关联，女性打工妹普遍追求陌生人的爱情，追求一见钟情，试图通过这种对爱情的追求来获得对现实都市生活世界的体验。

然而，如前所述，这无法摆脱其作为都市生活世界的陌生人身份，这种媒介化知识的碎片性、非互动性，使得其依然是一种对都市生活世界知识的虚假意义关联，无法真正转换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都市的诀窍知识系统。通过偶像剧的学习，女性打工妹无法获得都市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和诀窍知识，其对恋爱的诀窍知识的掌握始终是处于陌生人的状态，不知道知识背后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和意义网络是什么。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无聊，所以就迷恋上了用手机上DD，看爱情小说。记得有一晚，突然间有个陌生人要加我为好友，我一看对方资料也是俺们六安的，我就加了他。大夏天的晚上也睡不着，我就和他聊了起来，说我在家的苦闷还有一些女孩子的心思。我想反正他也不认识我，和他说说也无妨，而且还是老乡。可是慢慢地他就对我表露了爱意，并且要求和我见面，当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从上海回老家来看我啊！我就开玩笑似地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真没想到，隔天的时候，我还在田里面锄草，我妈喊我说有个男同学找我。回到家后，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毕竟在网上聊天我也没有真见过他相片，他说明来意后，我真的是太吃惊了，他长的挺帅的，就是个子不是很高。我当时就是觉得很浪漫，虽然没有正式交往，但是觉得在网上大家也熟悉了，也对他挺有好感的。当天晚上他就赶回上海了，可是他在网上找我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我当时因为没和他确定关系，也就没有告诉父母。还没过半个月，他又到

我家里了，还说要把我带出去打工，但是我父母肯定是不同意的，毕竟对他也不熟悉，他们家庭情况也不晓得。可我当时就像是鬼迷心窍了，觉得他就是我的另一半，而且他可以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就一股脑热地背着父母和他到上海打工了。”（L）

从L的经历中可以看出，L为现实中的浪漫所折服。当都市生活世界的共享知识——浪漫的爱情展现在自己的面前，这就意味着都市生活经验不再是一种非现实的或者只能旁观的体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充满内容的互动体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对这种都市生活世界知识体验的渴望，展现浪漫爱情的陌生人似乎是一个通往都市生活世界的向导，引导着L这样一个陌生人通往都市生活世界。

“现在想想真是后悔，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现在生气了，还开始动手打我了，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找个老家知根知底的，就算受委屈了，娘家人在旁边，他也不敢那么猖狂。”（L）

然而，这种虚假意义关联很快就暴露出来，L很快就后悔了。都市生活世界可望而不可及。而陌生人给自己带来的不是浪漫，不是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而是现实的伤害。L后悔没听父母的话，作为一种事后的归因，可以看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都市生活世界的陌生人，是很难掌握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和表达图式，从而真正将都市生活世界转换为自身的周遭世界和自然态度的。

对于作为陌生人的打工妹而言，她试图接近的都市生活世界的文化模式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一个需要冒险的领域。用舒茨的话来说，“并不是一种确然状态，而是一个有问题因而需要加以研究的论题，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来处理各种有问题的情境的工具，而是一种本身就有问题因而难以控制的情境”^[6]。

“我高中毕业后就到深圳去打工了……我在打工期间认识了经常来我们小店买东西的小王，他老家是江西的，慢慢地熟悉起来后，他和我告白了，我觉得他人也挺好的，脾气很好，而且对我很细心，我想和他交往，所以他每次约我出去逛街，我都答应了……我妈知道后特别生气，觉得离我们家太远，怕我嫁过去受委屈，就要挟我说，如果我再和小王在一起，以后就不让我回家了。我从小到大一直很听父母的话，也不想惹他们生气，当时和小王认识不到两个月，感情也没有太深，觉得为了他和我妈生气不值得，最后就不在深圳打工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就不想找外地人了，免得爸妈再为我烦心。在打工的日子里，觉得

离家太远,遇到什么事情都很难,所以爸妈张罗着在老家给我找个对象,我就默认了。去年的国庆节,爸妈就安排我和老公见面……我当时觉得条件也还行,以后只要我们自己勤快些,日子应该会过得很滋润。见面后,他不是那种看起来就让我动心的……我父母就劝我,让我趁早结婚,毕竟人家家庭条件不错,以后也不会受罪,我觉得父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自己一个人在深圳时也挺苦的,如果以后和老公在家做生意,一起努力,日子应该过得还不错……现在我觉得日子平平淡淡的,每天就是帮忙卖水果,以后准备开个超市,我们的小日子应该会越过越好。”(K)

K的择偶历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曾经试图结识同为陌生人的农民工,但是当发现在都市“遇到什么事情都很难”,正如舒茨所说“这个世界不仅在组织方式方面与原来的世界有所不同,而且也是难以驾驭,陷阱重重的”^[7]。当都市生活世界的文化模式难以掌握,始终只能成为一个都市中的陌生人时,女性打工者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成为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返乡者,找一个“知根知底”的配偶,摆脱这种陌生人的不确定性状态成为她们理性的选择。“所以爸妈张罗着在老家给我找个对象,我就默认了。”前述的L后悔于自己没有找一个知根知底的配偶,而K认为虽然返乡择偶缺乏都市生活的爱情体验,“日子平平淡淡的”,但是自身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脉络还是得以建立。作为一个返乡者,对于乡镇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打工妹是能够体验与共享的,知根知底背后的生活世界意义也就在于此。“我们的小日子应该会越过越好。”重返自己的内群体的生活世界,文化图式的熟悉性和诀窍知识的不言自明性使得女性农民工对自身未来的筹划有了确定性的保障。

二、返乡者：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生活世界的意义重构

作为一个返乡者,虽然新生代女性打工者回到了其自认为熟悉的生活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又可以像过去一样对所在的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运用自如。舒茨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意义关联系统的分析,指出返乡者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重新进入家庭时会面临的关联问题。在舒茨看来,家庭生活的群体成员共享着一套常规模式。“家庭生活遵循着某种有组织的、有关常规的模式,它们都是由一组传统、习惯、制度、所有各种活动的活动时间表等组成。日常生活

之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遵循这种模式而得到解决”^[8]。通过这套常规模式,家庭成员不仅可以确定他人现在的行动与未来的行动,而且可以对各种情形包括背离日常生活常规的情境予以驾驭和筹划。“通过使用这种模式,我就可以确信我不仅能够理解他人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也能够使自己被他人所理解。内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这种关联系统表明了程度很高的一致性”^[9]。正是这种意义共享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被舒茨看作是生活世界中形成自然态度的根源。对于这种共享的一致性知识的重要性,舒茨认为,正是通过这种一致性知识,他人的生活变成了自己生平的一部分,也变成了个人历史的一种成分^[10]。共享知识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与他人活生生的互动性、内容性与相互关联。然而,作为返乡者,在离开家乡生活世界的这段时间中,他已经步入了另外一种社会维度,而这种社会维度是被人们正在家中生活的关联图式所不能覆盖的,以往的各种经验就会受到重新评价。而返乡者在离开家乡生活世界的这段时间中,与新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个体意义的独特的意义关联,这种意义关联与家乡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返乡者离开阶段所在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化和类型化的意义关联迥然不同。因而,舒茨认为,对于返乡者而言,要想在家乡生活世界重新建立相互之间已经中断的“我们关系”,返乡者自身赋予其不在场阶段的各种经验的独特性和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和在家乡生活世界的人们赋予这些经验的虚假的类型化之间的差异是最重大的障碍^[11]。

可见,在舒茨的生活世界的视角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一个返乡者虽然回到了她自身的生活世界,但是由于其离开阶段所建立的独特的意义关联与家乡生活世界所对应的意义关联之间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返乡者也是一个陌生人,依然面临着一个生活世界意义重构的问题。当然,这个陌生人不再是前述的都市生活世界的接近意义的陌生人,毕竟,家乡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图式是返乡者所熟悉的,但是其在离开阶段与都市生活世界所发生的意义关联对于家乡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来说,是陌生的。

那么,面对两种不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图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是如何完成这种生活世界的意义重构的呢?

“我一直憧憬着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我自上次恋爱失败后,就不怎么相信爱情了,觉得人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父母也希

望我找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这样以后嫁过去也会少受点罪。对于男朋友的话，他最起码首先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做点生意，这样就不会为了吃穿发愁了。要对我们双方的父母孝顺，不然一个人品不正的人，对家肯定也没有责任心，以后这个家肯定是要散的。男人嘛，有点大男子主义我也不介意，但是不能够脾气太暴，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和我商议，这样以后我们才不会老是吵架。” (N)

N 同样经历过追求陌生人的爱情，但是如同前述，陌生人的爱情作为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对于陌生人而言具有风险，“我自上次恋爱失败后，就不怎么相信爱情了。”逃离这种陌生人对都市生活世界的伪意义相关的风险，“现实一点”，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成为一个返乡者，就成为 N 同样的选择。但是从 N 的叙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返乡者，她的个体性的意义脉络是双重的，既有对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的认知图式和表达图式（虽然是陌生人意义的非自然态度），又有对乡镇生活世界的原有的意义脉络的认知图式。因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混杂。

混杂原本是后殖民语境中由霍米·巴巴提出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巴巴试图讨论个体的文化身份中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冲突和碰撞、交流过程^[12]。在巴巴那里，混杂构成了对宗主文化或者说是主流文化的反抗。两种文化处于一种主宰和抵抗的冲突的流动状态。然而，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这里，这两种文化图式的混杂为什么没有出现剧烈的冲突而是一种并存状态，一种在 N 的叙事中非常自然的并存呢？这就与生活世界中的诀窍知识的特性有关。舒茨认为，生活世界中的人所具有的知识，并不完全是同质的。它是：第一，不连贯的；第二，只有一部分是清晰的；第三，根本没有完全摆脱各种矛盾的^[13]。这种图式和身份认同的混杂从生活世界的意义来说，恰恰是生活世界的知识不连贯性和矛盾性所导致的。这种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在这里表现为两种家庭性别地位的意义脉络的并存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既认同乡镇生活世界对家庭中男性的角色定义，又认同都市生活世界对家庭中女性独立性或者说是男女平等的定义，并且在认同上并没有觉得其在逻辑上的矛盾性。

“我还是想找个老家那边的，毕竟知根知底，这样也不会‘走弯路’。我认识的很多姐妹，找了个外地的，都和别人在一起后，才和男的一起回老家，去过之后才知道男的家有多穷。我不想冒险，还是希望踏

踏实的在老家找个对象。我希望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可以好些，这样以后我们的压力也会小些。性格上，我还是想找个合得来的，比较大度的男生，特别讨厌那种爱生气小心眼的男生，觉得这样好娘啊”。 (H)

寻找爱情，寻找陌生人的一见钟情，这种偶像剧的都市诀窍知识背后的伪意义相关已经被女性农民工所认知。陌生人不是进入都市生活世界的桥梁，相反，成为风险的来源。因而成为择偶意义的返乡者，寻找知根知底的择偶对象成为规避都市生活世界风险的女性打工妹的理性选择。上述的 H 也是一例。

“我到苏州打工已经有两年了，这边也有很多男同事追我，可是我心里面一点也看不上他们。” (H)

然而，作为一个返乡者，H 同样面临着对原有的生活世界进行意义重构的问题。H 对择偶的要求体现出和 N 相似的作为返乡者的双重意义系统，打工期间的个体对都市生活世界的独特意义关联，使得 H 在择偶中重视男性的个体性格，而原有的生活世界意义系统对男性家庭地位的重视，也依然在返乡者的认知中体现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女性农民工无意让原有的意义系统取代自身打工期间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意义关联，这就意味着，返乡在获得原有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稳定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原有生活世界意义重构的问题。返乡者不再是原有的生活世界的成员，而是具有了一定陌生性的成员。这种陌生性来自于其离开这段时间中其意义关联系统的改变，而解决这种生活世界重构问题的途径，就是 N 和 H 发展出来的意义和认同混合。在择偶中，强调传统的择偶标准和个体性的择偶标准的同时满足。

“妈妈一直跟我说，女孩子一辈子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老公疼她，让她没有生活负担，这个女人一辈子就应该知足了，我一直笑话老妈，觉得她们太懦弱了，什么都要依靠男人。我们现在和她们那代人可不一样，女孩子也可以打工，每个月好好挣钱，其实也并不比男的少，也能够养活自己。找个男的，就算是再会挣钱，如果和他在一起，没有感觉，也没有话说，我还宁愿不找。我对于男朋友的要求并不像父母那样，但是我还是希望男的个子和年龄比我大些，这样在他面前，我才会有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年龄大点的男生，心智更成熟，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出头露面。五官上只要看得过去就行，最主要是顺眼，人品好。至于他们的家庭条件我倒不是很在乎，我们自己都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 (X)

这种并置本身就是对原有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质疑

和重建。X 的在城经历使得她对家乡生活世界的性别意义系统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是陌生人的典型反应。而在这种质疑中,原有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也就被一定程度上动摇。X 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混杂的性别意义系统。这种混杂就是两种意义系统的非逻辑性和并置性。X 一方面觉得不能依赖男性,另一方面又要小鸟依人;一方面由男性来解决难题,另一方面又要双方平等,共同承担家庭责任。通过这种择偶标准的混杂,X 事实上重构了家庭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

然而,这种混杂性依然会使得女性农民工作为一个返乡者仍然是一个本地生活世界的陌生人,这种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依然取决于与之建立亲密性关系的“他者”对这种意义系统的熟悉和一致。

“他有时回来早点也帮我洗菜、摘菜,每次他这样子对我,我就觉得好幸福,知道他心疼我……慢慢地,他像是习惯了似的,不管我晚上加不加班,他都等着我回来做饭给他吃,有时我自己上班也很累,回到家也想休息会,可是他也不做饭,我为了省钱,也舍不得下馆子,最后也只好去做饭。有时他休息、我在上班时,脏衣服还是等着我洗,我和他吵了很多次,可是最后想想,他就算是洗肯定也洗不干净,还不如我自己做呢。” (M)

当男性不遵守乡村生活世界中的性别意义系统时,“他有时回来早点也帮我洗菜、摘菜,每次他这样子对我,我就觉得好幸福,知道他心疼我。”这种新的生活世界的混杂的意义系统,成为了一种一致性知识,女性作为返乡者的身份混杂的矛盾性还没有凸显,但是,当男性习惯于乡村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别逻辑时,两种意义系统从并置发展成为冲突性的意义脉络。而在这个过程中,M 从抗争(试图保持自己的返乡者的双重意义脉络)到屈服,完成了从返乡者到在地者的身份转变。然而,随着 M 与乡村生活世界意义脉络的达成一致,原先作为返乡者所努力的一种混杂的生活世界建构也就随之消失。

但是,在成为一个在地者之后,陌生人和返乡者无法获得的生活世界中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也就随之而来。

“和他相处将近一年半了,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和他商量,想听取他的建议,只要他在我旁边,我就觉得像是吃了个定心丸,不过老是这样,他有时也会觉得我烦。但是我想,男人就是我的依靠啊,什么事情就是应该和他说……我一直觉得他很细心,也

很会照顾我,和他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 (L)

当 L 选择在择偶过程中成为在地者时,其知识与意义脉络完全与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男权制作为一种性别意义脉络也就随之得到了再生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男权制的再生产过程是 L 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其对安全感的寻求,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稳定性的寻求的能动结果。

L 的选择也就说明了这种混杂性的返乡者的生活世界意义建构,作为双重意义系统,本身是不稳定的。D 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过 22 岁生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还是牌子的,我觉得很好吃。”送品牌蛋糕过生日这种行为方式,无疑是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因此,D 很欣喜,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她的男友。然而,她的男友却是一个有着都市生活世界知识并放弃了乡镇生活世界意义系统的人:“他特别懒,从他打工到现在几乎没有存钱,他一点也不知道为家人着想,碰到天气热了,他就不上班,觉得那样太辛苦,说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应该活得太累。”

为家人着想,是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当 D 的男友不认同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时,D 试图建构的这种生活世界的混杂意义脉络就无法保持稳定:“我真后悔自己找个这样的男人,没有一点进取心,也没有一点担当。” (D)

从 D 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保持混杂的意义脉络的稳定性非常困难。因为,混杂的意义脉络的稳定,事实上意味着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家庭地位。如果说,L 选择了放弃混杂的意义脉络,完全接受丈夫代表的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从而成为文化身份意义的在地者,进而获得了生活世界的不言自明性和确定感。在这个过程中,L 确立了丈夫的家庭地位,社会性别得到了再生产。D 同样面临着这一难题。丈夫无意认同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这也就意味着 D 试图重构家庭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的权力被质疑和搁置。可见,返乡者能否成为文化图式意义的被接纳者,在与乡村生活世界重新发生意义关联的同时,保持个体独特的与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关联,建构出混杂意义系统的家庭生活世界,这既是一个文化图式的问题,同时也是微观的互动权力问题。身份与意义系统的混杂并不一定带来所谓的多元的身份认同和抵抗,相反,当这种混杂缺乏可以实现的家庭权力资源时,会使得女性农民工陷入一种生活世界建构过程中的身份困境。



父权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互动中的性别权力和家庭地位生产,在乡村生活世界中,它首先是诀窍知识,是不言自明的女性必须认同的互动知识。这就意味着,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其生活世界的意义重构的向度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排序性的。在大多数情境中,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是主导性的。女性的家庭角色不仅仅是小家庭的妻子,同时是大家庭的媳妇。这种乡村生活世界的性别意义系统的生产是强有力的。

“结婚后不到一年,我就生了宝宝,老公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开出租车,让我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当时婆婆身体也不怎么好,我在家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为一家子洗衣做饭,一天忙到晚。这和我以前预想的生活完全不同,我想结婚后和老公待在一起,找个小厂上班,应该也不会太累。老公现在自己一个人在上海,我心里也很挂念他,可是家里又离不开我。”(R)

当意义混杂变成意义冲突,女性农民工在小家庭与大家庭的角色扮演中同样面临这种意义系统的冲突所导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R 寄希望与丈夫过二人世界,但是又摆脱不了乡镇生活世界中媳妇对大家庭的角色义务。当 R 终于到了上海和丈夫团聚时,这种身份认同的混杂引发的困境也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回访中,得知她目前也在上海上班,但是一直想念孩子,有时看见别人的孩子带在身边,会偷偷地流泪,打算“十·一”的时候让婆婆把孩子也带到上海)。

三、结 论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都市生活

世界的陌生人,始终无法有效地建立起与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关联,与陌生人的爱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不是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相反由于这种伪意义关联,成为其生活风险的来源。因而,成为择偶意义的返乡者,是女性农民工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感的主动和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其建构生活世界意义也就是舒茨意义的自然态度的主动和理性建构。然而,作为返乡者,在获得意义关联的同时,也意味着其作为乡村生活世界的陌生人,同样面临着生活世界意义重构的问题。在这个重构过程中,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和都市习得过程中个体性的意义系统出现了并存的混杂现象,从而使得女性打工妹作为一个能动者能够建构出新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的生活世界的建构本身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一方面来自于混杂意义本身的矛盾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打工妹在择偶过程中所面对的乡村意义系统背后的父权制,这使得女性打工妹作为一个返乡者会出现身份认同的困境。■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陌生人”的社会学研究》(课题号10YJC840087)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还得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资助(课题号:NR20100008);“2012年国家公派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

张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

胡同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参考文献:

- [1] 吴鲁平.农村青年择偶观从传统向现代的位移[J].中国青年研究,2000(3):12-14;纪晓岚,朱逸等.传统与现代: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诠释—基于上海九星市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1(3):64-68;吴新慧.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与婚姻[J].中国青年研究,2011(1):15-18.
- [2] 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S1):36-38;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12-18.
- [3][5][6][13] Alfred Schuetz(1944).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9,No.6(May),pp.504,506,506,500-501.
- [4] [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2-233.
- [7][8][9][10][11] Alfred Schuetz (1945).The Homecom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0,No.5(Mar).pp.369、370、369、372、374.
- [12] Huddart,David(2006).*Homi K.Bhabh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7.